

戰後初期臺灣的圖書出版 —1945至1949年

蔡盛琦

摘要

本文探討戰後初期臺灣的圖書出版，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後的臺灣，隨著政權的轉移，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這歷史的變動中，圖書的出版順應著時代的趨勢，展現其不同的出版特色。為更清楚看出戰前、戰後圖書出版的轉變，本文首先談的是日治時期的圖書出版概況，然後探討戰後影響臺灣圖書出版的背景因素，分別從文化上、經濟上及政治上這三方面來看，文化上因面臨到文字語言的轉換，經濟上因印刷、造紙工業的衰退與通貨膨脹，以致民間圖書出版更加困難，在政治上經歷過二二八事件後帶來的創傷，讓知識分子開始退縮，思想言論上受到限制，此時的臺灣正面臨到一段圖書缺乏、精神空虛的文化沙漠期。

這階段所出版的圖書，其中以官方宣導品占多數，這是因為官方掌握了印刷資源，得以大量出版；而在教育環境改變下中文教科書奇缺，民間出版社機構應時應需求的出版不少教材、教科書；另一方面此時民眾對新時代充滿了期待，以介紹象徵國家圖騰的國旗、國歌與三民主義的圖書，成了建構國家民族認同的媒介；而由於語文的限制，日文創作減少，中日文對譯的圖書出版，彌補了這段時期精神的缺口。1949年以後因政府遷臺，政治環境的丕變，與社會人口結構的改變，整個出版活動又有不同的發展，綜觀而言，圖書出版既受到社會變動的影響，同時也影響著社會。

關鍵詞：出版史、圖書出版業、官書、教科書、翻譯圖書

Taiwan's Publications in the Postwar Years —1945-1949

Sheng-chi Tsai*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publications in Taiwan immediately after World War II—from August 1945 when Taiwan departed from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o May 1949 when the Martial Law was enforced. As Taiwan left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for a new political situation, its publications also assumed a new character. This paper started with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publications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order to contras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re-and post-war eras. Then it analyzed the cultural,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new circumstance for publications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postwar years. Culturally, there was a change in the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Economically, it was a hard time for publishers due to the economic recession then. Politically, the traumas brought by the 228 Incident drove intellectuals to stay away from sensitive political issues. This was a time when Taiwan experienced a lack of publications and became a “cultural desert”.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new era were mostly of the propaganda type produce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had controlled over the printing business, and had p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textbooks in Chine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public was provided with plenty of books symbolizing the totems of the national flag, the national anthem, and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People*. These publications became the medium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o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new government and the new ethnic group.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ublication of books in Japanese was restricted. As a result, the publishing of Chinese-Japanese books made up for the situation.

After 1949 whe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moved to Taiwan, not onl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changed drastically but also population structure differed greatly. To meet the new situations, publications after the 1949 underwent a rather new. While they were a

* Assistant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result of the social change, they also affected the society in development general.

Key words: History of Publication, Publishing Business,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Textbooks, Translations

戰後初期臺灣的圖書出版 —1945至1949年*

蔡盛琦**

壹、前言

臺灣在經歷51年日本殖民統治之後，隨著政權的轉移，又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段時間的臺灣同時面臨到語言文字的轉換與經濟的變動，再加上二二八事件後，創作與出版環境的改變，此時臺灣正面臨到一段圖書缺乏、精神空虛的文化轉型期。

出版是一種傳遞文化的事業，圖書本身即承載著多元的意涵，它除了是傳遞知識、保存文化的載體外，其印刷技術與紙張，亦反映出當時的經濟及生產力量；其精神內容，所表徵的則是一個時代的思想潮流。過去對於這段時期出版文化的相關探討，有莊惠惇的碩士論文《文化霸權·抗爭論述—戰後初期臺灣的雜誌文化分析》與何義麟的《戰後初期臺灣出版事業發展之傳承與移植（1945-1950）》，以上兩篇談的是戰後雜誌的出版與文化分析；對於戰後圖書出版的相關探討並不多，雖有辛廣偉的《臺灣出版史》，但泛論的是從戰後到九十年代，包括臺灣的圖書、雜誌、有聲出版品的各類出版；而邱炯友的《臺灣出版簡史》一文，談的時間是概述戰後到民國六十幾年出版狀況；蔣紀周的《我國圖書出版事業之發展與現況》一文，則由漢唐直述到政府遷臺以後。因此本文擬以戰後初期的圖書出版為

* 本文承蒙兩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收稿日期：2004年5月13日，通過刊登日期：2004年6月11日。

** 國史館助修

主題，探討在戰後社會變動中的圖書出版；所論述的時間是從1945年8月臺灣接收後，到1949年5月實施戒嚴令宣布全省戒嚴為止。¹

為了瞭解戰後初期的臺灣圖書概況，主要參考資料有1947年出版的《臺灣年鑑》、《重修臺灣省通誌》中的「光復初期之圖書出版事業」、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印的《館藏中文圖書目錄—民國元年至38年》、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臺灣一年來之宣傳》及文建會出版的《戰後臺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等書，及全國圖書資訊網中的書目資料，並且透過幾份戰後重要的期刊、報紙，如《臺灣文化》及《臺灣新生報》、《民報》、《公論報》上所刊登的出版消息與書商廣告，來看當時圖書出版的情形。

本文首先談日治時期的圖書出版概況，藉以對照戰前、戰後圖書出版的轉變；然後分別從文化上、經濟上及政治上三方面來探討戰後初期影響臺灣圖書出版的重要因素；其後討論戰後臺灣的圖書出版情形；最後希望藉由對這段時期圖書出版的梳理和描述中，讓我們看出在社會文化轉變下，圖書出版是如何順應時代的趨勢，展現其出版特色。

貳、日治時期的圖書出版事業概況

日治時期的臺灣，在經過日本51年殖民政策影響下，所呈現的圖書文化，與過去清朝治理時全然不同，首先是因為知識分子不再以科舉為讀書的目的，過去科舉用書已不如以往重要，以一般士人、遊宦、善書為主的中文圖書市場，在日文使用日漸普及下而逐漸式微；另一方面則是印刷技術自日本引進，臺灣開始真正有現代化的圖書印刷技術，圖書的形態也由過去的石印線裝書進步到鉛印洋裝書，此時不論民間出版社或官方機構出

¹ 1949年以後所訂定的「戒嚴時期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對臺灣圖書開始實施嚴密檢查制；另一方面，大陸老字號出版社隨著政府遷臺，使得臺灣圖書市場生態面臨新的轉變，這段時期的圖書出版事業與戰後截然不同，將另篇探討。

版，已呈現較具規模的出版活動。²

除了印刷技術的改進，出版量也呈逐年增加的趨勢，由1925年至1934年的「臺灣出版物送調查表」中可看出出版品增加的趨勢。

表1：臺灣出版物送調查表³

(單位：本)

時 間	1925年	1926年	1930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單行本	817	914	1182	1482	1347	1225

這時期的圖書出版以日文為主，其出版特色有：1.官方出版品種類多、數量多，占了出版量的大部分；2.民間出版品以文藝創作居多；3.許多中文圖書仍在大陸出版印製。

官方出版品不但數量多，而且種類多，其內容性質許多是為了清楚瞭解臺灣環境，便於統治，而進行的調查紀錄，如人口調查、土地調查、國勢調查、風俗慣習調查；也有的為便於推行殖民教育，所編印的各類教科書；更有為宣揚政績而留下的施政紀錄，如《領臺十年史》、《臺灣歷代總督治績》、《始政紀念—四十年間的臺灣》等書；有的為振興產業，對農林水產、礦業、工業等亦有詳盡的調查研究。⁴

從《臺灣統治綜覽》一書的記載中，即可看出在1908年時已出版的官方出版品，多達200多種，該書並將這200多種的圖書，分為十類，這其中包括了法規、戶口、土地、氣象、交通、衛生、貿易、殖產、雜書、統計

² 蔡盛琦：日治時期臺灣的中文圖書出版業，〈國家圖書館館刊〉，91年2期，頁67。

³ 轉引自吳瀛濤：日據時期出版界概觀，〈臺北文物〉，8卷4期（1960年2月），頁47。

⁴ 臺灣省文獻會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文化事業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會，民國84年），頁318。

等。⁵

而官書出版機構的眾多，由上至下，除了臺灣總督府是最主要的出版機構外，⁶尚有各地方政府機構也有出版一些官方法規調查報告等；⁷還有一些研究機構，如製茶試驗場出版的《茶樹栽培試驗成績書》；農事試驗場出版的《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等，舉凡有利於其政令宣導的都在出版之列。

在民間出版方面，一些移民來臺的日本官吏與學生喜歡從事俳句、和歌之類的文藝性創作，因此民間出版了不少這類書籍；西川滿是當時著名

⁵ 以上參考 公刊圖書，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臺灣統治綜覽》（明治41年，成文出版社1985年影印）。

第一類法規類，有《臺灣總督府法規提要》、《臺灣衛生法規則》等25種。

第二類是戶口類，有《臺灣現住戶口統計》、《戶口調查用語》等13種。

第三類是土地方面的出版品，有《臺灣島豫察地圖》、《臺灣全圖》等8種。

第四類是氣象類，有《臺灣氣象報文第一》、《臺灣氣象表》和《基隆氣象觀測及其他調查摘要》等三種。

第五類是交通類的圖書，有《郵便線路圖》、《郵便電信辦理提要》等6種。

第六類是衛生類，有《臺灣醫院年報》、《赤痢病研究報告》等11種。

第七類是貿易類，有《明治三十一年外國貿易概況》、《明治三十二年前半年外國貿易略表》等11種

第八類是殖產類，圖書數量最多，多達67種，如《臺灣產業調查錄》、《殖產報文》等。

第九類是雜書，內容不是雜書，而是圖書性質不屬於以上各類的圖書，如《香港論》、《緬甸錫倫報告》等52種。

最後一類則是統計方面的圖書，有《臺灣總督府第一統計書》、《國勢調查法》等19種。

⁶ 如總督府曾出版《臺灣稅務法規》、《臺灣現行通信法規》、《埤圳法規》，是為了宣導法令；各類調查報告、研究成果如《臺灣全圖》、《臺灣總督府鐵道年報》、《臺灣島地質礦產圖》、《臺灣度量衡調查書》、《臺灣街庄植樹要鑑》便於統治者更能了解臺灣；教育文化事業的推廣方面如《日臺小辭典》、《學校教育須知》、《臺灣教育志稿》等，是為了實行殖民教育。

⁷ 這些統計資料是為了宣揚其統治成果，如宜蘭廳出版了《宜蘭廳例規類聚》、《宜蘭廳勸業統計表》、《宜蘭廳第一統計概要》；臺南廳出版《臺南廳例規》、《臺南廳第一統計書》；臺北廳編印《臺北廳治一斑》；桃園廳與新竹廳分別編印《桃園廳志》、《新竹廳志》。

的在臺日人作家，從1935年到1949年之間出版了25冊自己的詩集與小說，他自設出版社命名為「媽祖書房」，出版了個人作品《媽祖祭》、《楚楚公主》、《貓寺》、《亞片》；媽祖書房改名「日孝山房」後又陸續出版了《繪本桃太郎》、《嘉定屠城紀略》、《臺灣顯風錄》、《臺灣風土記》等等。

當然這時期也有其他不少出版品，都是由書店兼營出版的，如新高堂書店出版了《領臺十年史》、《領臺五十年史》、《臺灣？資源—其經濟的價值》等；杉田書店出版了《血染士林川？漂流船》、《光風》、《遊光集》、《臺灣出版關係法令釋義奧付》等；位在太平町的還有大木書房，是本省人李清輝所開設，出版了矢野峰人著的《半面像》、《黑？獵人》兩部詩集；清水書店出版了王昶雄的《鏡》；其他還有文明堂、盛興書店等均是當時有名的書店，除售書外並兼營出版。

在日治時期雖然陸續仍有中文圖書的出版，但相形之下中文圖書就失色許多，這是受到殖民政策影響下的必然現象，一方面是中文圖書的出版，受到言論自由的箝制；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推廣日語教育，抑制本土文化及漢語書房，中文的使用受到限制，⁸在種種不利的因素下，出版品種類局限於私塾所用的教科書、具宗教意味勸人為善的善書及詩社盛行的詩集文集等；後來在新文學運動下出版了一些符合時代精神的白話文作品，如張我軍的《亂都之戀》、《中國國語文作法》等；在技術上，也因印刷設備的中文字體的缺乏，許多臺灣的中文圖書仍需在大陸出版印刷；如有李文元的《存真堂雜稿》，是在光緒28年（1902）時由福州刊刻的；李春生的《天演論書後》，在光緒33年（1907）時，由福州美華書局印行，另一本《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也是由美華書局印行的；鄭家珍的《倚劍樓詩文存》，是由泉州古華閣書局刊行；後來到了1922年時還有林履信的《希莊學

⁸ 《臺灣民報》，大正13年（1924）12月1日，版1。在社論中提及由於漢文書房被嚴重取締，學習漢文的學生減少，在大正6年時唸漢文書房學生尚有17,641人，到大正11年時則驟減到3,670人。

術論叢》，交由廈門宏文社印行；陳懷澄的《媪解集》，是七言絕句詩集，在1934年時由上海大一統印刷廠石印成書，許地山的《落花生小說集》則是由上海新月書局所發行。⁹除了中文印刷字體臺灣比不上大陸外，整個出版環境並不利於中文圖書的出版，真正在臺灣出版的中文圖書數量並不多。

這種情形到了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出版品的檢查更趨嚴格，出版品的特色是戰爭色彩濃厚，文學出版品極少；戰爭末期受限於資源缺乏，印刷用紙開始採配給制，實施一連串措施，如《出版用紙配給割當規程》、《出版物配給調整規程》，出版品幾乎是為政策服務，¹⁰臺灣的圖書出版呈現一片萎縮。

2、戰後影響臺灣圖書出版的背景

經歷戰爭後的臺灣經濟一片蕭條，又正處於新舊政權交替，文化轉型的過渡時期，不論在文學表現上、圖書出版上同樣仍是一片萎縮。在《臺灣年鑑》文化一章中認為戰後臺灣文學界所面臨到的：第一是表現形式的問題，第二是關於思想自由的問題，第三是刊物的成本太貴。¹¹同樣的問

⁹ 日治時期在大陸出版的中文圖書部分，參考王國璠編撰：《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省立新竹社教館，1974年）。

¹⁰ 河功原作，黃英哲譯：戰前臺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下）—以三省堂為中心，《文學臺灣》，29期，頁208。「1943年5月21日臺灣總督府公布出版事令的施行規則，此時臺灣與日本實施出版許可制。臺北成立了『臺灣出版協會』，臺灣出版協會以出版業者、出版團體組成，目的在強化軍國主義思想、限制印刷用紙和出版物配給管理。」
河功原作，黃英哲譯：戰前臺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下）—以三省堂為中心，《文學臺灣》，29期，頁207。「『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臺北支店，統一在臺書籍雜誌配給業務。使臺灣與日本內地相同，不承認任何書籍雜誌批發業者的存在，除日配臺灣支店以外，任何人均不得從事雜誌書籍的批發。因此，日本內地出版物移入臺灣的配給和臺灣出版物的配給，均由日配臺灣支店統一處理。」

¹¹ 黃玉齋編：《臺灣年鑑》（臺北：海峽學術，2001年），頁1404，本書原於民國36年由新生報出版。

題也反映在雜誌出版業上；根據何義麟在「戰後初期臺灣出版事業發展之傳承與移植」一文所述，原本戰後臺灣民間出版與官方出版刊物，因過去許多關於出版的禁令取消，臺灣的雜誌出版曾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了一段時間，但此榮景只持續到1946年上半年。到1946年下半年起，文化出版業也面臨到相同的問題：1.語言轉換之問題，1946年廢止報紙雜誌的日文欄；2.言論出版自由之限制，1946年以後出版須先申請登記，若有違規可令其停刊；3.物價波動之影響，除通貨膨脹外，紙張供應也成問題。¹²

從以上文學、雜誌出版困境來看，圖書的出版也同樣面臨到文化、經濟、政治上這三方面的衝擊。首先是文化上，面臨到語言文字的轉換問題，慣用的日文被禁止後，民眾對於中文報紙、圖書在閱讀上感到困難；另一方面，創作者在寫作上都要從學習中文開始起步；而經濟上，因為印刷、造紙工業的衰退與通貨膨脹，與圖書出版相關的印刷工業大部為官方出版品所占用，印刷用紙缺乏、物價波動，以致民間圖書出版更加困難；在政治上，二二八事件帶來的創傷，讓知識分子開始退縮，思想言論上受到限制，以下則分別從三方面來看戰後臺灣的社會。

一、文化上一語言文字的轉換

日治初期，臺灣日語普及率並不高，在1915年時日語普及率僅占1.63%；¹³後來由於私塾教育受到刻意地壓抑，並推行日本語文，在1932年

¹² 何義麟：「戰後初期臺灣出版事業發展之傳承與移植（1945-1950）」，《臺灣史料研究》，10期（1997年12月），頁5-6。

¹³ 臺灣戶口調查部：「大正四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記述報文」，轉引自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民國81年），頁318：「在日治初期，日本人尚允許中文出版存在；到了大正2年（1913）時，總督府的官廳命令、文告不再附譯漢文。在1915年時的戶口調查顯示，臺人中能聽、講日語者，僅佔總人口數的1.63%。」

時懂日語的臺人，開始增加，已占總人數的22.7%。¹⁴

到1933年時，總督府更是制定「國語普及十個年計劃」，以全臺每一部落設一講習所為原則，預定十年內使懂日語臺人比率達到50%以上；除了廣設公學校以日語教育學生外，並大量設置日語講習所讓社會人士學習日語，供未受教育的社會大眾學習日語，這也是使用日語人數增加原因之一，因使用日語人口明顯增加，日文成了新知識分子所使用的語文。根據統計到了1943年以後，懂日語的人已高達到51%以上；¹⁵也有的統計推算在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語普及率大約達70%。當時臺灣人口約有600萬，照此比例估算，使用日語的人最少有420萬。¹⁶當時許多年輕人相信只要懂得日文就掌握了打開世界文明的鑰匙；到了日治末期，臺灣的年輕人頗習慣講日語，要他們用臺灣話來做知識性的溝通已感到困難。¹⁷

因此戰後初期那段時期，在臺灣出版與發行的仍以日文刊物為主。戰爭結束後，臺灣所有的報章上都開始出現日文、中文並列的狀況，歷史彷彿又重演臺灣文學剛剛發展的時候，報章上的文學作品，無論是詩、小說、散文、評論，都是中、日文並列，高興寫日文的就用日文寫，以日文來發表；喜歡用中文的用中文寫，用中文發表，一份雜誌甚至一張報紙裡面都有中日文並列的狀況。但這樣的狀況維持不久，即在政府的政令下日文部分被禁掉了。¹⁸

¹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民國81年），頁359。

¹⁵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市：正中書局，民國81年），頁359。

¹⁶ 黃英哲：許壽裳和臺灣（1946-48）兼論二二八前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文化政策，《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1992年），頁118。

¹⁷ 周婉窈：臺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新史學》，6卷2期（1995年6月），頁134。

¹⁸ 鍾肇政著，莊紫容編：《臺灣文學十講》（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頁43-44。在臺灣文學剛剛發展出來的時候，報章上的文學作品，無論是詩、小說、散文、評論，都是中、日文並列，1937年時日本總督府禁用中文，中文才從報章上消失。

在臺灣接管前，1945年3月23日所頒布的「臺灣接管計劃綱要」中，即已制定了「剷除敵人勢力」¹⁹、「增強民族意識」²⁰的兩項原則，在此原則下禁用日文則為首要，²¹當時行政長官公署從日本人接收政權不到四個月，在1946年2月時，行政長官公署即公告查禁日人遺毒書籍，開始禁止日文書籍及雜誌，對於已出版的日文出版品，採取銷毀與取締方式；該公告列出了八條查禁的圖書，²²然後由各縣市政府公告各書店、書攤，自行檢查封存日文違禁圖書，聽候處理；在公告查禁書籍的四個月後，在1946年6月23日時，根據宣傳委員會主任的報告，依統計全省焚毀違禁圖書已達1,451種，47,500餘冊；²³如果由地區性來看，在1946年8月時，臺南市宣導股為以剷除日人遺毒圖書為由，在市內檢查出《南方建設論文選》等書籍63本及唱片12片皆銷毀；²⁴在臺北市方面，在1946年12月時，由宣傳委員會會同警務處及憲兵團檢查臺北市的違禁圖書，共焚毀了7,300多冊日文書；至於其他七縣市所焚毀的日文圖書有10,000冊以上。²⁵

¹⁹ 「臺灣接管計劃綱要」的第一項 通則 第一條：「臺灣接管後一切設施，以實行國父遺教、秉承總裁訓示，力謀臺民福利，剷除敵人勢力為目的。」

²⁰ 「臺灣接管計劃綱要」的第一章 通則 第四條：「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

²¹ 薛化元等編註：《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七）—新聞自由》（臺北：國史館，民國91年），頁28。1945年3月14日公布的「臺灣接管計劃綱要」中第七條：「接管後公文書、教科書及報紙，禁用日文。」《臺灣年鑑》，政治，頁469。在「臺灣省接管計劃綱要」第六條教育文化部分其中第12款：「日本佔領時代印行之書刊、電影片等，其有詆毀本國、本黨或曲解歷史者，概予銷毀，一面專設編譯機關，編輯教材，參考，及必要之書籍圖表。」

²² 行政長官公署公告「查禁日人遺毒書籍」，所列出的查禁八條為「1.贊揚『皇軍』戰蹟者；2.鼓動人民參加『大東亞』戰爭者；3.報導佔領我國土地情形，以炫耀日本武功者；4.宣揚『皇民化』奉公隊之運動者；5.詆毀總理總裁及我國國策者；6.曲解三民主義者；7.損害我國權益者；8.宣傳犯罪方法妨礙治安者。」見薛化元等編註：《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七）—新聞自由》，頁40-41。

²³ 夏主任談本省宣傳事業，〈臺灣新生報〉，1946年6月23日，版4。

²⁴ 《民報》，1946年8月21日。

²⁵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臺灣一年來之宣傳》（臺北：該會印行，民國35年），頁24。「宣傳委員會為肅清日人在文化思想上遺毒起見，特訂定取締違禁圖書辦

對於慣用日語日文的臺灣民眾，驟然面臨到日文不能再使用，必須重新學習國語，不但在閱讀書報上受到影響，對於過去從事日文創作的作家而言，更是苦不堪言。

這一連串日文禁用的措施，使得日文圖書銳減，造成知識分子可閱讀圖書的缺乏；到了1946年10月25日，連報紙雜誌上的日文版也一律撤除，報紙禁用日文版，對民眾影響很大，於是各界陸陸續續不斷的呼籲能暫緩實施此一政令：先是1946年7月時，高雄市參議會陳情要求，報紙禁用日文版的規定希望能展期一年；²⁶到8月時，又有臺南市參議會也請願要求，暫延實施日文廢止的規定；²⁷接著，新竹縣參議會建議延期；²⁸到了9月中旬，花蓮港縣參議會也請求長官公署延期廢止報紙日文版。²⁹另外，期刊上對此亦有反映，《新新》第6期中即說：「此無異封本省人之耳目，從青年層到壯年層皆對毫無效率的當局之過度做法，其為怨歎與非難。」³⁰接著第7期又發表吳濁流的「日文廢止？對？？管見」一文，表示不滿當局禁止日本語政策；雖在各界不斷的要求延期下，報紙的日文版仍於1946年10月25日起取消。

在禁用日文的同時，「推行國語」是另一項重要課題。在接收前的「臺灣教育接管計劃草案」中，即規劃要將原有的「日語講習所」，改為國

法八條，公告全省書店、書攤，對於違禁圖書應自行檢查封存聽候處理，並由署令各縣市政府遵照辦理，至於臺北市部分，則由本會會同警務處及憲兵團檢查，計有違禁圖書八百三十六種，七千三百餘冊，除一部分由本會留作參考外，餘均焚毀，其他各縣市報告處理違禁圖書經過者，計有臺中、花蓮、屏東、高雄、臺南、彰化、基隆等七縣市，焚毀書籍，約有一萬餘冊。」

²⁶ 臺灣青年未熟國文，各報日文請准展期，《臺灣新生報》，1946年7月28日，版4。

²⁷ 日文廢止大？？苦痛，《臺灣新生報》，1946年8月13日，版4。

²⁸ 《民生報》，1946年9月1日，版3。

²⁹ 臺胞國文程度尚淺，要求延期廢日文版，《臺灣新生報》，1946年9月18日，版5。

³⁰ 日文廢止？時期尚早，原刊於《新新》第6期（1946年8月）。轉引自黃英哲：許壽裳和臺灣（1946-48）兼論二二八前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文化政策，《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18。

民學校成人部或民眾學校，並以教授國語國文為主旨。³¹

當陳儀在重慶主持「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的時候，就邀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魏建功、黃家霖、王玉川三人商討光復後的國語推行計畫。光復後，邀約來臺擔任國語推行工作的一共有8人，他們在1945年11月底自重慶出發，到臺北已是1946年2月了。人員到臺灣後，一方面籌設推行機構，一方面從上海廈門等離臺較近的地方繼續邀人來臺。³²到了1946年4月時，行政長官公署即正式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要工作是調查研究國語及臺語方言、編審國語教材及印刷、訓練國語師資及推行人員、輔導國語教學等。³³

當時的教育處長范壽康曾在《臺灣文化》發表〈本省教育事業的現狀及今後的趨向〉一文，談及對此國語教育的推行，是採分層負責辦理；由教育處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各縣市並設置國語推行所，推行所以下，又分區設置國語講習班，分層負責辦理普及國語事宜；另外從1946年8月份起，教師在施教時一律使用本國語言（包括本省方言），不准用日本語講授，希望在這雙管齊下的措施下，國語能迅速普及。³⁴

戰後初期，即有報紙對於長官公署即將推行國語運動的問題，提出見解：1.要求教授國語者不可以征服者的態度出現，強迫接受國語並無必要，臺灣同胞會自動學習的，相信在一、二年內臺灣國語便可普及；2.學國語者

³¹ 臺灣教育接管計畫草案：「接管後，應規定國語普及計畫，限期逐步實施。中小學以國語為必修科，公教人員應首先遵用國語，並先訓練國語師資。」轉引自傅寶玉編：《抗戰與臺灣光復史料輯要：慶祝臺灣光復五十周年特刊》（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84年），頁325。

³² 紫翔：〈臺灣國語推行的回顧與展望〉，《公論報》，1949年2月14日，版3。

³³ 參考何容、齊鐵恨等編著：《臺灣之國語運動》（臺北：省教育廳，1948年），頁11-12。黃玉齋編：《臺灣年鑑》，頁1046-1047。「關於國語教育實施工作，有一、廣播示範。二、編印學習用書，如注音符號、對照字錄等各類學習用書。三、編印國音標準書。四、注音符號。」

³⁴ 范壽康：〈本省教育事業的現狀及今後的趨向〉，《臺灣文化》，1卷1期（1946年9月15日），頁3。

不可抱做官心理，為巴結官吏而學習國語。³⁵

但是在各地方真正開始推行國語運動時，往往為了迅速普及國語，常常因執行方法上的失當，引起民眾的反感。例如在1948年1月時，花蓮縣國語文推行委員會（所）公告：「自二月一日起，說日本話為應受立正或勞動服役之處分。」此公告一出即引起民眾的不滿；楊雲萍在其《近事雜記》一文中，即說：「對於芟除日本的『文化遺毒』，或是推行國語文的工作，我們是滿腔贊同的，可是事關『文化』或是語言，當要有適宜的方法和妥當的步驟；不是一昧地『硬幹』就可了事，就可成功的；此乃極淺明的道理。只是老實說，現在我們還沒有和這『委員會』諸公，討論這些問題的興趣和時間，我們只想要請問『委員會』，是根據甚麼法律或是『命令』，而得來『公告』限制人民的『自由』的『公告』？『委員會』是根據甚麼『手續』而得有如此的『權力』？再要請問所謂『縣國語文推行委員會』是甚麼性質的機關？」³⁶並批評國語推行所不了解「教化」工作的性質，不知道尊重「憲法」，這不只是一個「推行國語文」的問題而已！誠如文中所說的，語言推廣要有適宜的方法和妥當的步驟，並非硬幹即可成事。

戰後行政長官公署的國語政策施行太快，不但讓原本以日文從事閱讀與創作的知識分子無所適從，更讓學生們面對國語教科書的缺乏、標準教師嚴重不足的學習環境。事實上語言文字的轉換並非一蹴可及，這種現實狀況，執政者也並非全然不曉，由官方所印製動輒數萬冊的日文宣導品、或日文的《三民主義》來看，執政者當然知道民間仍習慣日文的閱讀，只是為了達成推行國語的績效，往往忽略了當時的民情。

二、經濟上一印刷、造紙產業的衰退

在戰爭末期由於動員協助日本而物資艱困，加上美軍的轟炸，戰後初

³⁵ 國語問題（社論），《臺灣新生報》，1945年11月8日，版1。

³⁶ 楊雲萍：《近事雜記（十二）》，《臺灣文化》，3卷2期（1948年2月1日），頁19。

期，經濟問題顯然成為一大危機。陳儀國家化、凡事干預的經濟政策，非但未能紓解，反而加深了臺灣的經濟危機，這危機使得外省人和臺灣人之間的緊張度大增。³⁷陳儀在1945年11月20日設置「臺灣貿易局」，不久又公布日治時期的「專賣局」繼續存在。貿易局經營日本財產的接收，獨占全部臺灣的對外貿易；專賣局獨占樟腦、煙草、火柴、度量衡品的供給。³⁸不良的管理造成失控的通貨膨脹和大量失業，印刷與印紙荒的問題，使得圖書的出版更加不易，而書價隨著波動的物價一路上揚。

印刷工廠的接收

原來日人所經營的印刷公司，戰後一律由行政長官公署接收。³⁹其所成立的「臺灣省印刷紙業接收委員會」接收了過去之前臺灣七家印刷廠、兩家油墨廠、五家造紙廠，統合為「臺灣省印刷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接收各廠見表2。

³⁷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羅珞珈譯：《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件》（臺北：時報文化，1993年），頁148。

³⁸ 蕭聖雄：臺灣二二八事件的經濟和文化背景，〈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90。

³⁹ 薛化元等編註：《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七）—新聞自由》（臺北：國史館，民國91年），頁34。對於當時印刷設備的接收在「中央宣傳部接管臺灣文化宣傳事業計劃綱要」的第七條：「臺灣????印刷株式會社改為臺灣印刷公司，由公署接收，其餘沒收之小規模印刷所由本部特派員會同公署擬訂處理辦法呈中央核准後實施。」

表2：臺灣印刷紙業公司所接收之印刷廠

接收後名稱	接收前名稱
第一印刷廠	臺灣書籍印刷株式會社
第二印刷廠	吉村商會印刷所
第三印刷廠	盛進商事株式會社
第四印刷廠	盛文堂印刷所三宅彩印會社
第五印刷廠	臺灣照相製版株式會社
第六印刷廠	臺灣交通商事株式會社
第七印刷廠	寶文社印刷所
第一油墨廠	臺灣印刷油墨工廠
第二油墨廠	山本油墨株式會社
第一造紙廠	臺灣紙業株式會社
第二造紙廠	藤本製紙株式會社
第三造紙廠	臺灣興亞紙漿工業會社
第四造紙廠	臺灣紙漿株式會社
第五造紙廠	臺灣櫻井興業株式會社

資料來源：臺灣印刷紙業公司籌備處啟事，《臺灣新生報》，1946年7月10日，版3。

在籌備過程中即引起民間印刷業者的反彈，認為此獨占組織影響民間業者甚大。⁴⁰印刷公司被統合接收後又包辦了各機關各種印刷，獨占官書出版品的印刷，影響民間印刷公司的生存。在民間出版尚未臻熟的階段，大量的官方宣導品，為「印刷紙業公司」所壟斷，於是民間業者發生一連串工潮。

在1946年7月臺灣印刷紙業公司籌備處成立時，民間印刷業者即召開臨時大會，訴求「反對壓迫民間印刷業者」，並由公會提出兩項要求：1.長官公署取消「一切印刷品交省營印刷紙業公司及公營印刷廠承辦」之命令。2.解決失業印刷工人問題。民間問題尚未解決，同年11月時，由於臺灣印刷紙業公司管理問題，印刷工人、排字工人罷工；1947年1月時印刷紙

⁴⁰ 《民報》，1946年7月16日。

業公司第一工廠全體工人罷工；1月底時第二廠員工總罷工；2月時印刷工潮持續擴大；印刷工人要求八小時工時、星期日放假、並提高工資，經多次糾紛協商，⁴¹1948年1月時各報印刷工又要求提高待遇，⁴²印刷工潮影響到刊物的延遲出版，《臺灣文化》即為此而遲刊多次，從「編後記」中為遲刊的致歉說明可一窺其因，不外都在於印刷工廠的事情。⁴³

除了印刷業者的罷工事件外，中文印刷字體缺乏，亦影響印刷品質，原本印製日文圖書的印刷廠即已缺乏中文字體，臺灣所使用的鉛字活版印刷字體，必須進口「上海體」鑄字模。⁴⁴宣傳委員會在1946年工作計畫中亦說到這問題：「本省鉛字缺鋅，其質易軟，用於轉動機，每至模糊不清。」並建議向上海購買；另外，為改良印刷品質，所使用的油墨，宣傳委員會也建議向內地購買濃色油墨，以資備用。⁴⁵

雖然生產下降是戰後世界各地的普遍現象，但是官營印刷紙業公司的經營不善，使得印刷產能的降低，亦影響臺灣的圖書出版量。在1949年3月時的《公論報》社論對此提出批評，認為在日治時期，日人在臺灣經營的印刷工廠約二十餘家，占了全臺印刷量的70%。戰後日人所經營的印刷廠全部由政府接收，所組織的「臺灣省印刷紙業公司」，因經營不良，後來除部分保留軍用外，其餘標售民營，雖然印刷設備及技術不算落後，各種印刷品如中西文書籍、鈔票、郵票、圖籍等均能承印。但是印刷量到1949年時僅及日治時期的三分之二。對此印刷蕭條的原因歸結於：一方面是各方面人士對文化教育事業的不夠重視；另一方面則由於一般人民對於維持最低的生活都感到吃力，那有能力購買報章書籍雜誌？⁴⁶

⁴¹ 《民報》，1946年7月24日、11月7日，1947年1月17日、1月30日、2月5日。

⁴² 《公論報》，1948年1月27日，版3。

⁴³ 編後記，《臺灣文化》，3卷5期（1948年6月），頁17。

⁴⁴ 王士朝：《文學圖書印刷設計之演變》，收錄於《五十年來臺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訊，1976年），頁31。

⁴⁵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工作概況》，頁68-69。

⁴⁶ 日治時期年印刷量約5,000開，每月消耗紙張約在一萬令左右。1949年時印刷量3,962開。東之：《急待拯救的臺灣印刷工業》，《公論報》，1949年3月6日，版3。

物紙荒

除了印刷工人的罷工外，紙張來源又是問題，紙荒亦影響著文化事業的發展。在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不到一年的時間，米價漲了10倍左右，但紙價卻漲了17倍之多；⁴⁷不但紙張漲價，油墨、工資、運費都漲一倍至數倍之多；⁴⁸到了1947年時，又因造紙的毛毯及銅絲網缺乏，以致造紙業產量不足，面臨紙張缺乏的窘境，長官公署除了要求《新生報》縮減四分之一篇幅外，臺灣紙業公司的新聞用紙全部供給臺灣書店應用，停止對外出售。⁴⁹到了1949年1月時，更由於臺灣紙業公司的經營不善、資金拮据，以致高雄、臺南紙廠停工，⁵⁰民間出版印紙取得無異是更加困難。

紙張產量的不增加，洋紙又禁止輸入，黑市紙價拼命高漲，對圖書出版又是一致命傷。

1947年時經濟上面臨破天荒的變動，物價狂漲，一般民眾連生活都感到困難。米荒加上「紙荒」，致使一般出版業者束手無策，僅僅一個月的時間，九百餘元的紙價竟漲至三千餘元。⁵¹在《臺灣文化》紙荒—文化破壞的前兆一文曾談到紙荒問題：「在這一般物價狂漲當中，最苦悶的是出版界。出版物最主要因素是紙，而紙在這一個月間，約漲三倍，且日日上跳，不知所止，致使印刷業者無法承印，雖有意承印，也無法估計，縱估計了，印刷成本竟漲至三倍以上，即上月定價二十元的刊物，這月不得不定六十元了，否則不能出版的。」⁵²

《臺灣文化》的售價一個月間漲了3倍，報紙也漲，圖書亦跟著漲價。1948年以後出版品均需配給紙張，於是出現了靠配給紙圖利的不法商人，

⁴⁷ 本省新聞業的危機，《臺灣新生報》，1946年6月22日，版2。

⁴⁸ 為本報加價敬告讀者，《臺灣新生報》，1946年7月1日，版2。

⁴⁹ 中央社通訊報導：紙業公司近況，轉引自薛化元等編註：《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七）—新聞自由》，頁112。

⁵⁰ 《公論報》，1949年1月5日，版3。

⁵¹ 《臺灣文化》，2卷3期（1947年3月），頁24。

⁵² 《臺灣文化》，2卷3期（1947年3月），頁11。

先申請成立一個文化團體，再向當局申請領配給紙出版刊物，例如每月領四百令白報紙的，所印書刊不到所領的十分之二三，其餘紙張，自然流入黑市，用低價買的配給紙，在黑市中用高價出售，一轉手之間，就可賺到暴利，即使在自己書刊出版上所虧的一點錢，也從配給紙生意中賺回來了！⁵³原本受紙荒影響的出版業，受到這些不法商人的圖利哄抬，更是雪上加霜。

三、政治上一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對戰後臺灣來說是個重要的分界點，在政治上，行政長官公署結束，1947年5月16日臺灣省政府成立；在文化上，許多社團文化機構因主持人被抓而結束；在思想言論上，雖然新的省政府發表解除戒嚴令，停止新聞、圖書、郵政之檢查的措施，但仍使圖書創作進入低潮期。

原本禁用日文階段，不論閱讀或創作都不如以往，再經歷二二八事件後，許多言論受到限制，圖書內容更無法多元的呈現。

對於此次事件當局歸結為報紙的宣傳影響，認為他們利用言論自由，詆毀政府，「這次變亂的發生，亂黨暴徒到處毆打殘殺外省同胞，直如中風狂奔，甚至公然背叛國家，完全是受了這些報紙毒素的宣傳的影響，言論自由，固然應該尊重，但濫用言論自由從事惡毒宣傳的人也應該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⁵⁴

另一方面當局鼓勵檢舉文化人，⁵⁵於是經歷這次事件後，許多知識分子不是被逮捕、就是遇害，不然就是遠走他方，這種情形如《臺灣新生報》李萬居社長遭軍人、警察毆打，臺北《民報》社封鎖，王添燈被逮捕，

⁵³ 金聖泣：報銷文化，《公論報》，1948年4月12日，版4。

⁵⁴ 社論：誰是臺灣的罪人？，《臺灣新生報》，1947年2月18日。

⁵⁵ 文化漢奸厲行檢舉：「新聞記者如有觸犯處理漢奸案件條例第二條第七款之規定，即曾在偽組織管轄範圍內，任報館、通訊社、雜誌社、書局、出版社社長、編輯、主筆或經理，為敵偽宣傳者，應予厲行檢舉。」《臺灣新生報》，1947年3月23日，版2。

《中外日報》社封鎖，社長林忠賢被逮捕，《大明報》社封鎖，總編輯馬銳籌、主筆王孚國、編輯陳遜桂、文野等被逮捕，《重建日報》封鎖，社長蘇春皆（楷）被逮捕，《人民導報》封鎖，社長宋斐如（前教育處副處長）被槍殺，臺中《和平日報》建議國民黨三中全會懲戒陳儀遭停刊。⁵⁶臺灣文化協進會主幹之一的林茂生（曾任《民報》社長、臺大文學院院長）徐春卿遇害，宣傳組主任蘇新逃亡中國大陸。《臺灣文化》本土作家也有多人遇難，如呂赫若在逃亡中喪生，吳新榮、王白淵被捕坐牢。⁵⁷即使未被逮捕的知識分子此時也因而封筆不敢寫作。

除了創作減少外，出版社書店也因此受到波及，如三民書局的蔣渭川於1947年3月4日與其他學生、民眾代表等40人面見陳儀，提出「改革目前臺灣政治」⁵⁸的要求後被逮捕。

據《公論報》所刊的統計資料，因受二二八事件影響，或本身經營有困難，不能繼續發刊者，或言論失當而受停刊處分，當局已撤銷登記的有53家之多。⁵⁹

二二八事件後對文化界的影響，除了許多知識分子被抓，一些報社停業，少了許多發表言論的刊物；當時欲有系統大規模出版圖書的編譯館，在1947年6月時隨著長官公署的結束而撤館，此一系列的出版計畫也告終止。

因此二二八以後，對於臺灣的青年來說，即邁入新的階段，相當寬大的言論自由和身體保障被取消了，好多青年社團被解散了，連學生集會也成問題，加上大陸戰亂情勢的日漸嚴重，戡亂時期的特種法令實施日漸增多，此時的臺灣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政治低潮。對青年的影響是，在社會上「聽不見青年們衷心的呼喊，看不見青年們的活動，沒有一個真正代表

⁵⁶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年），頁184。

⁵⁷ 黃英哲：許壽裳和臺灣（1946-48）兼論二二八前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文化政策，《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29。

⁵⁸ 《臺灣新生報》，1947年3月5日，版1。

⁵⁹ 《公論報》，1948年1月18日，版1；1948年1月9日，版3。

青年利益的團體，沒有一張真正為青年說話的報刊，一切集體的自發行動都不再出現了，剩下一些唯美主義的，似是而非的，慘綠青年們的文藝性活動。」⁶⁰

因此戰後第一代作家，他們所經歷的年代，是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最恐怖的年代開始，從這樣一步步走來，在他們的作品當中，很難看出對於當時社會的反映，特別是戰後臺灣社會變遷狀況的描寫。⁶¹

肆、戰後臺灣的圖書出版

戰後臺灣中文圖書缺乏，僅有的中文書仍是一些過去的舊籍，在1945年11月的《新生報》中說到當時中文圖書缺乏的情形：「目前中文的讀物幾等於零。愛讀的情緒，如饑如渴，而所有的書籍，恐不外《三字經》、《幼學瓊林》、《薛仁貴征東》、《羅通掃北》等。」⁶²而這些舊籍根本無法滿足知識分子的需求。

到了1947年7月復刊的《臺灣雜誌》中，呂士炎在「臺灣需要新鮮的精神食糧」一文中，仍是形容臺灣出版界凋零，臺灣的文化正像是一塊荒廢的田園。因此戰後臺灣中文圖書的缺乏，依靠著由上海進口。當時臺灣的輸出入莫不是以上海為中心，實際上是上海及其背後地帶的市場；臺灣的砂糖、煤、水果等銷往上海；上海的綿織品、麵粉及其他日用品供給臺灣。經濟關係如此，文化出版關係亦是如此，上海亦是全國出版業的中心，臺灣所進口的中文圖書亦由上海銷來臺灣。這是因為臺灣受限於印刷及銷售量的關係，無法大量印製出版品，所需中文圖書大部分仍依賴外地進口；如日治時期所需日文圖書，大部分仍由日本進口一樣。也因此像是省立圖書館，為了解決館藏問題，特別撥購書經費每月5萬元赴上海採購中

⁶⁰ 臺灣青年往那裡走？，《公論報》，1949年1月26日，版3。

⁶¹ 鍾肇政著，莊紫容編：《臺灣文學十講》，頁260。

⁶² 建設臺灣新文化，《臺灣新生報》，1945年11月6日，版2。

文圖書。⁶³所以流通於臺灣的中文圖書，真正在臺灣本土出版的數量並不多，那個時期的出版數量，目前沒有正式統計，僅根據臺灣省文獻會所編《臺灣近代史》中統計1952年時出版數量是427種，1953年的出版數量是892種，⁶⁴如果以這數量來推測1952年之前戰後初期的年出版量，應是少於427種的。

戰後臺灣的圖書出版，面臨語言轉換問題，這期間習慣以日文創作的作家，出版品銳減，因此即使由臺灣本土出版的圖書，大都也是中日文對照，這剛好符合習慣閱讀日文，又要學國語民眾的需求；在國語運動推行下，許多圖書都是針對學國語而出版的國語教材、會話、辭典等；而一般民眾在戰後對新時代充滿了期待，於是出現許多以認識祖國為題的圖書；但是這些民間出版品量仍比不上掌握印刷資源的官方機構，以下探討當時臺灣出版圖書的特色。

一、官方宣導品的大量出版

日治時期的官方出版品，除了大量的調查報告外，各類的宣揚施政成果的出版品，不外是統治的宣導工具；戰後臺灣在經歷過政治重整、文化重建的過渡時期，圖書出版也成了建立國家民族認同的工具。

於1945年11月成立的宣傳委員會，除了接收各報社、廣播電臺、通訊社各宣傳事業外，並負責替行政長官公署做文化宣傳工作，尤其是藉由圖書出版做有關政令宣導，行政長官公署藉由印刷廠、造紙廠、油墨工廠的接收，掌握了絕大部分的印刷資源，得以大量印製官方出版品。先是在1946年時開始大量翻印《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總裁言論》等書籍，數量都在3,000到5,000本左右；為了使臺灣人民普遍明瞭陳儀建設臺灣之準繩，還編印了《陳長官治臺言論集》，第一集即印了15,000本，分贈給

⁶³ 省立圖書館籌購，〈臺灣新生報〉，1946年6月13日，版2。

⁶⁴ 臺灣省文獻會編：《臺灣近代史》（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7年），頁312。

各機關學校團體及省訓練團受訓學員研讀；⁶⁵其他還有編印各類工作概要及《新臺灣建設叢書》等等。

真正數量可觀的是在1946年時將《三民主義》譯成日文，共印了10萬冊；除了中文翻譯成日文的圖書外，也有將日文翻成中文的《臺灣指南》，這是日治時期所印製的指南，將內容稍加增補後譯為中文，印了5,000冊，供遊覽人士參考；此外，還編印一些中日文對照的出版品，如：《民主政治手冊》等宣傳小冊，印製量更達30多萬冊，這些宣導品書籍都是分贈各學校機關團體及省訓團學員或廉價出售。⁶⁶據統計僅在1946年6月23日時，宣傳委員會已編輯發行有關主義、政令書即達34萬餘冊。⁶⁷

除了長官公署龐大的出版外，其他機構也有圖書的出版，如省訓練團，該團主要是訓練各級行政幹部人員，為因應訓練需要，編印了許多教材，分發給各學員研習，其中共同科與專業科教材印了84,630冊，另外出版叢書也印了84,000冊。⁶⁸省署民政處曾出版《臺灣民政第一輯》，其內容為臺灣正史沿革、人文自然、光復經過及日本統治時代政策等；並且針對公務人員出版了《公務員必讀》，內容包括國家施政綱領、法律知識服務等，這些都是非賣品。⁶⁹以上這些大量官方出版品均為官方統治的宣導品，真正官方機構有計畫系統的出版，應自臺灣編譯館開始。

隸屬行政長官公署的官方機構編譯館，以許壽裳為館長，成立於1946

⁶⁵ 《臺灣一年來之宣傳》，頁22。

⁶⁶ 《臺灣一年來之宣傳》，頁22。《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文化事業篇》，頁353。

⁶⁷ 夏主任談本省宣傳事業，《臺灣新生報》，1946年6月23日，版4。

⁶⁸ 黃玉齋編：《臺灣年鑑》，政治，頁517-518。總共編印（鉛印的）教材84,630冊，另出版的叢書有：《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計劃建設與趕學科學》、《三十五年度工作要領》、《科學的群眾時代》、《科學的道理》、《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施程序》、《接管臺灣工商交通之基本方針》、《總理行誼》、《地方建設問題》、《黨員守則之意義國父遺教大同新輯》、《團主任講詞》、《中國國民黨政綱政策》、《本團精神講話講詞選輯及五權憲法》等十二種，計8萬4千冊。

⁶⁹ 《民報》，1946年7月16日。

年8月，以下分設四個組：1.學校教材組；2.社會讀物組；3.名著編譯組；4.臺灣研究組。除了將於後面談到編中、小學教科書的「學校教材組」外，其他各組的情形是：「社會讀物組」，編輯的是一般民眾的讀物，原計劃以中日文、中英文對照的方式，解決中文圖書閱讀的問題。⁷⁰其出版內容則無所不包，全部統稱為《光復文庫》⁷¹叢書，其中包括了許壽裳編的《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楊乃藩編的《簡明應用文》、黃承燊編的《標點符號的意義和用法》、《四書淺說》、傅溥的《通俗物理學》、蔡鎮的《中國故事集（上）》、袁聖時的《龍門童話集》、皇甫珪的《中國地理現狀》與馬漢光《王充傳》，都是屬於《光復文庫》，這些都是為了因應當時民間學習中文的急迫需要。

「名著編譯組」，構想則來自於日本大量翻譯世界名著出版，原計劃於短時間內譯出世界名著五百部，以提昇國民文化水準，其中許多世界名著是由日文翻譯而來，其中該組出版了李霽野譯《莪默詩譯》、《四季隨筆》、李竹年譯《我的學生生活》、劉文貞譯《鳥與獸》、劉世模譯《伊諾克亞敦》、金瓊英譯《價值論》、《美學的理想》、謬天華譯《論語今譯》。

至於「臺灣研究組」，是對臺灣歷史文物作系統的研究，由楊雲萍主持，其中日本學者國分直一也被羅致，專門研究後龍、苑裡及圓山貝塚等的考古工作。⁷²臺灣研究組並分兩部分別出版了梁嘉彬《琉球亡國實錄》、張常惺《過去日本在臺灣之科學活動及其成績》、賴子清《臺灣府縣志藝文志索引》、廉新生《瘧疾特論》、素木得一摸《臺灣昆蟲誌》等，這些出版品皆屬於《臺灣研究組編譯鈔校》的叢書，同時亦編印《臺灣學報》期

⁷⁰ 《光復文庫》「編輯綱要」第五條：「為適應本省民眾目前之需要起見，擬以一部分書籍出版中日文對照本或中英文對照本。」

⁷¹ 《光復文庫》「編輯綱要」第八條：「本文庫版式一律三十二開，每本約二萬至四萬字，每書同一版式，以出版先後編列目錄出版至數十本或一百本時再就內容性質分類，另印詳目作為第一期，然後再出第二、第三期，學校、團體、家庭，得此文章，即可成一小圖書館。」

⁷² 以上參考楊乃藩：許壽裳與臺灣省編譯館，《傳記文學》，55卷6期，頁88。

刊，對於臺灣研究整理工作功不可沒。

這些有計畫的出版在1947年5月時因編譯館撤銷而停頓，為期僅9個月，移交時編譯館除了已印成圖書二十餘種外，還有稿件三百餘萬言，尚未出版。⁷³

二、中小學教科書的缺乏

前面曾提過戰後初期臺灣的中文圖書缺乏，市面上僅有的中文書仍屬過去的舊籍，如《三字經》、《幼學瓊林》、《薛仁貴征東》、《羅通掃北》等之類的石印本；到了1946年，臺灣不但缺書情形並未改善，連中小學教科書都無法供應，楊乃藩在《怎樣供應本省的精神食糧》中說道：

談到書籍，則尤其貧乏得可憐。本學期中（1946年）只有薄薄的五冊暫用課本，算是全省中小學數十萬學子的唯一精神食糧。下學期的課本雖然在趕編，但能否全部供應都很成問題。⁷⁴

因此戰後教科書嚴重缺乏，雖然可以使用「國定本」、「部定本」，但在1946年開學時，學生尚無課本可用，如此教師無法循序漸進，學生則有摸不著頭緒之感，為了應付上課，學校也不得不東拼西湊，以解燃眉之急。⁷⁵於是出現各校所用的課本，高、初中不同的班次，使用相同的課本；或相同的班次，而居然用不同版本的課本，這樣凌亂不銜接的教學，足以

⁷³ 章微穎：《三十六年六月，臺灣省編譯館結束，爰賦短章呈第翁座》。轉引自黃英哲：《許壽裳和臺灣（1946-48）兼論二二八前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文化政策》，頁125。

由《臺灣年鑑》書中來看尚未完成的書有汪培元《通俗歌曲集》、梁甌倪《美國的女子》、黃承榮《經典淺說》、梁嘉彬《中國史通論》、楊雲萍《劉銘傳與臺灣》、趙英若《第二次世界大戰故事》、唐傳基《中國發明史略》、盧英芳《三民主義淺說》、朱毅如《我國的憲法》、楊乃藩《古今文選百五十篇》、張常惺《中日文同音異義字彙》、謝康《臺灣三百年史》、《大同西銘及其他》等。

⁷⁴ 楊乃藩：《怎樣供應本省的精神食糧》，《臺灣新生報》，1946年6月11日，版5。

⁷⁵ 《中央日報》，1950年1月18日，版7。

引起學生的厭惡和不良的反映。⁷⁶當時中央社記者張任飛曾隨同陳儀南下視察後，報導當時學校普遍缺乏國語課本，他在參觀某學校時發現該校以昭和10年出版的《高等漢文》為課本，是書不僅程度上不適於教學，亦且充滿殖民地教育的色彩。⁷⁷

陳儀為此將編審室改為編譯館，承自原教育處編審室的工作，將它直屬於長官公署，不隸屬教育處，希望能儘快解決教科書的問題。於是在許壽裳主持下的省立編譯館，雖然分為四組，但初期編譯館的重點，仍放在編撰教科書為主的「學校教材組」上，從編譯館初成立時，陳儀所說的可看出：

編譯館雖分四組，但在明年，尤其上半年，希望特別注重中小學教科書一類。過去教育處所編中小學教本，據一般試用的結果，多半嫌太深，教學都覺困難，希編譯館就已編各書檢討一下，或修改，或另編，務使適合於國語國文程度尚不及各省學生的本省學生，俾暑假後可以應用。⁷⁸

雖然編譯館邀請專家應急編輯或修改完成了初、高兩級的《國語文》教科書，但因為是以大陸版本為藍本修訂，以致對於初學國語的臺灣學生來說，仍是生字太多。據臺北師範附小研究報告指出，所編輯完成的教科書內容過於艱深，每課生字至少占半數以上。⁷⁹因此教科書的不適用與嚴重缺乏，除了用字對初學國語者來說，過於艱深外；對於編譯館所修改的課本有許多根本不適用於臺灣，內容上有許多問題，尤其史地兩科，仍是戰前內容，來不及更改，所以朝鮮仍屬日本版圖，缺乏戰後現代史，許多內容只能由老師們在課堂上補充，而許多國定本教科書的內容無法因地制宜，如生在沒有下雪的臺灣兒童，無法理解冬日雪景的景象，多少影響學

⁷⁶ 倪瑟仙：當時臺灣教育諸問題，《臺灣新生報》，1947年3月2日，版1。

⁷⁷ 首峰：談本省語文教學，《臺灣新生報》，1946年11月27日，版6。

⁷⁸ 《臺灣年鑑》，頁85。

⁷⁹ 怎樣推行國語教育，《臺灣新生報》，1946年11月27日，版6。

生對國語教育的興趣。⁸⁰而民間各書店所發行「臺灣版」的教科書，其品質也因紙張惡劣，而印刷欠佳，與其他省的教科書紙張有所不同。

到了1947年時，暑假要開學前，課本仍不敷使用，於是省教育廳下令，各級開始收借舊的教科書，以補救下學期的書荒。⁸¹

到1948年時，教科書大部分由原本依賴進口，開始有本土出版社出版，適合臺灣的教材暨參考書，先是東方出版社陸續出版了《機械用語新字典》、《初中國文自修輔導》、《高小國語自修指導》等補充性質的參考書。在同一年，商務印書館也出版了《新小學文庫》、《新中學文庫》，這兩部大部頭的套書在商務印書館臺灣分館與省教育廳合作推廣下，由省教育廳統購600多部分發各國民學校，而《國民教育文庫》亦以代電通知各小學聯合統購，在臺灣有不錯的銷售成果。⁸²由於教科書的缺乏，使得官方、民間都必須投入教科書市場，在這有限的出版資源下，以致影響其他類別圖書的發展。

⁸⁰ 首峰：《教科書》，《臺灣新生報》，1946年11月27日，版5。談編輯小學教本，《臺灣新生報》，1947年12月26日，版4。

⁸¹ 教育廳令各校收借舊教科書，《臺灣新生報》，1947年6月12日，版4。

⁸² 臺灣省政府祕書處編：《臺灣省政府公報》，夏字第35期（南投：臺灣省政府祕書處，民國37年5月11日），頁510。臺灣省教育廳於37年5月7日，代電各縣市的小學，電文如下：「竊唯國民教育為整個教育之基礎，敝館為補助國民教育之推進，除供應教科用書外，近於師生雙方應用之整套參考書，復擬具有系統之編印計劃，其專供兒童閱讀者，曾編印《新小學文庫》二百冊，現已出齊，並仰賴鈞廳彙購六百數十部，分發各國民學校，使各學校咸能通宜之課外讀物，其專供教師閱讀者，最近復編成《國民教育文庫》一百冊，分為進修、補習、教育狀況、行政訓導、教材、教法、鄉村教育、成人教育等組，已出四十八冊，餘書於五月內出齊。《國民教育文庫》之執筆者，或為當代教育名家，或為各地輔導專員，或為實際從事教學之優良教師所著，各書均能發揮正確之理論，表現宏富之經驗，戰後最新資料亦多已採入，俾讀者可在進修行政施教各方面獲得切實之裨助，該文庫現正發售，特價照原價七五折計算，每部計售臺幣四萬另五百元。茲為優待彙購起見，凡一次購滿全集一百部者，得照特價再打九折，即每部僅實收臺幣三萬六千四百五十元。隨文附國民學校，或通飾各校聯合彙購，使各校教師均有優良讀物可資進修，提高師資水準，即所以提高教學水準，國民教育之推進，將於此獲致實效，不僅敝館感幸已也。」

三、國語學習教材的出版熱潮

這階段另一重要的出版是國語學習教材的出版潮，前面已說過戰後初期臺灣在「國語推行委員會」的推行下學習國語，事實上在「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以前，臺灣民眾學國語即已是一股潮流，六百萬同胞爭學國語的狂潮，簡直比「搶購」、「擠兌」還熱烈。關於國語的書，只要出版就有人買，並且絕對能暢銷；教國語的人，只要敢教就有人跟著學，並且絕對受歡迎。

在爭學國語狂潮階段，教授國語的教師充斥各種方言，彼此不盡相同；就連市場上的國語書籍，也缺乏統一標準，有的是用日本假名注音的「北京話」，有的是用四十個注音字母注音並保留入聲的國語。面對這麼多不同的國語，不再搶購各式國語書籍，開始要求的是標準國語！

雖然當時有教育部公布的《國音常用字彙》，但該書仍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倉庫，並未來臺。國語推行委員會把政府歷次公布的國音標準規定彙集起來，編成《國音標準彙編》，由行政長官公署公告全省：「一切注音讀物悉以此書為準。」可是印刷困難，遲至1947年1月才印製出來，還是拿到上海印的。⁸³在面對不同標準的國語及教材的缺乏，學國語的狂熱逐漸冷卻下來。

這股學習國語的熱潮，據姚隼在〈臺灣文化的飢渴〉一文中敘述：「臺省的國語運動已相當普遍，公教人員和學生不用說了，就是商店裡的店員，工廠的工人，以及僕役下女們，都在學習，連我住的那個公家宿舍的一個管門人，每天晚上都在熱心不懈地唸著國語呢。」⁸⁴

在戰後最初期學習國語階段，臺灣的三省堂立刻開始販售過去私塾所使用的《三字經》、《千字文》、《千家詩》等學童識字書，但此類識字圖

⁸³ 以上在臺灣推行國語情形，參考紫翔：〈臺灣國語推行的回顧與展望〉，《公論報》，1949年2月14日，版3。

⁸⁴ 姚隼：〈臺灣文化的飢渴〉，《臺灣新生報》，1946年11月4日，版4。

書已不符合當時的需要；接著三省印書館又從大陸進口經銷了一些《華語自修書》及經銷《華語學生辭典》、《國語發音辭典》等書，⁸⁵但是這些全中文的書籍對於慣用日文的臺灣人來說仍感困難。

東寧書局則針對仍慣用日語的臺灣民眾，出版以日文解說學習中文的圖書，1945年11月出版《華語新聞？讀？方．基礎篇》、《初級華語會話》，另外1946年時東寧又出版了日人種村保三郎所編的《獨習華語入門》⁸⁶，這些都是以日文學習中文的入門書。

除了日人經營的書店外，當時本土的書店亦有出版，如臺南的崇文書店在1945年迅速的出版了郭克仁編的《白話文速成法》；嘉義的蘭記書局，則針對慣用臺語的人編印工具書，於1946年出版了《國臺音萬字典》，是以臺語學習國語；其他還有《國臺音小辭典》、《日文對譯國語大辭典》等。⁸⁷

蘭記書局在1946年7月10日，又出版全中文的《國音標註中華大字典》，由黃森峰編輯，一共4冊，⁸⁸該書一出版即銷售一空，8月時又再印1萬部，此時售價也隨之上漲一倍。

東方出版社亦於1946年時出版《對譯日華辭典》，針對臺灣人從日本語查出國語，並有注音對譯；另外還出版黃和光所編的《國語常用語句例解》一書，該書也是將日常會話及寫作要句，以中日文對照方式編輯而成。⁸⁹而以日文學習國語是當時普遍的方式，不論中學生和大學生在作文時，先用日文起稿，再去掉平假名、片假名，換些中文字，略改句法，循著日語的思路寫出中文作文。⁹⁰上述這些學習國語教材及工具書，都是針對民眾學習

⁸⁵ 《臺灣新生報》，1945年11月25日，版1廣告。

⁸⁶ 臺大圖書館有典藏該書。

⁸⁷ 以上參考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藏中文圖書目錄—民國元年至38年》（臺北：該館印行，民國71年）。

⁸⁸ 《臺灣新生報》，1946年7月27日，版3，蘭記書局廣告，此套書目前國家圖書館仍有典藏。

⁸⁹ 《臺灣新生報》，1947年7月1日，版1廣告。

⁹⁰ 何容：方言為國語之本，《臺灣新生報》，1947年6月1日，版2。

國語而紛紛出版的。

當時一般民眾為了學習國語，其進修方式不外有：自修、上語文補習班及聽廣播教學。聽廣播學國語是大部分民眾學國語的重要管道，廣播教學從1946年12月開始，透過電臺施行空中教學教授國語，一天有兩時段播放，早上是從7點25分到7點55分，晚上則是從6點到6點半；於是為了配合廣播教學，市面開始出現了各類的廣播教材讀本，如1946年11月出版了由陳忠所編的《國語廣播教本》，另外還有《初學國語文》（注音本）、《民眾國語讀本》（含注音與臺灣音兩種標注方式），以上兩冊編者不詳。

地方上也陸續成立國語研究會，並自行編寫學習教材，臺中的國文普及研究會在1945年時自編《速成國文讀本》，1947年時臺南書店出版了臺南南友國語研究會編的《精撰實用國語會話》。

屬於官方書店的臺灣書店出版了齊鐵恨主編的《初級國語文》與《國語變音舉例》，時間分別是1947、1948年。1946年時臺灣評論社則出版了張公輝的《國字整理發揚的途徑》。

戰後不論公家私人出版者，對於國語學習用書出版頗多，這些書或以練習交際會話為主，或以培養閱讀書報能力為主，當然更有因為升學或求職的需要，許多工作都要求會中文，尤其是在公家機關找工作，於是配合就業需求的出版，如《最新白話商業書信》、《最新白話普通書信》、《臺灣適用白話文速成法》、《臺灣適用白話文讀本》等書亦有不錯的銷售成績。當然也有針對升學的圖書，如褚後俊編的《國語升學指導》是1947年時由三民圖書公司出版。

戰後順應學習國語熱潮而出版的會話、辭典等，銷路很好，這是因為不論就業與升學，都必須學習國語，這是純粹現實生活的考量；而戰後初期在民眾嚮往祖國的熱潮下，認識中國及其歷史時勢的圖書，似乎成為另一股出版潮流。

四、反映社會思潮的圖書出版

戰後初期，臺灣同胞熱血沸騰的懷著效忠祖國的一股熱忱，對新時代充滿了期待，這種熱忱除了從國語開始外，認識祖國及負起時代使命也成了重要的課題，於是針對這種情緒的圖書出版，即反映出當時整個社會的思想潮流。

這類圖書有以認識祖國為題，以象徵國家的國旗、國歌，與建設國家經典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及時代的代表人物孫中山、蔣介石等為主的圖書，透過這些象徵的圖騰，以建構國族的認同，形成一股市場熱。

從報紙上所刊登的廣告來看，最早出現這類圖書，是1945年11月《新生報》的廣告，由新青年書局所販售的《三民主義》（民族篇）及光華公司出版的全中文版《三民主義問答》，以問答型式闡釋三民主義，認為是最快入門的簡明圖書，這些多是由大陸進口經銷的中文圖書；其流通上受限於中文版，可閱讀人數不多，銷路並不好。

事實上一直到1946年10月25日報紙禁用日文以前，日文、日語在臺灣仍然普遍使用，不但本省人和日本人，本省人和本省人之間，經常使用日文和日語，就是大陸各地來的公務人員和本省人談話通信也多使用日文，這種現象非常普遍。⁹¹在仍普遍使用日文的情形下，將中文圖書譯為日文應該有較好的銷路。

1945年11月，東寧書局印製種村保三郎所翻譯的日文版《中國？運命》，很快的出現在市面上；同時亦陸續出版了日文版的《新生活運動綱要》、孫文《三民主義的研究》及《孫中山先生傳》。

臺北的長風書店在1945年時出版了《蔣主席軼事》，學習出版社在1947年時出版了高良佐的《中國革命史話》。

⁹¹ 楊乃藩： 禁用日文日語議，〈臺灣新生報〉，1946年6月5日，版2。

另外還有光明印刷公司出版社，針對戰後臺灣同胞為對象的出版品，有李雲編著的《黨旗與國旗》。上海啟明書局針對臺灣民眾的需要出版了日文版的《三民主義明解》。

1947年4月時報紙廣告上出現中日文對照的《中華民國憲法讀本》，出版者不詳，對此書的介紹是以講述憲法為經，以淺明方式說明民主政治真諦。⁹²屬官方性質的臺灣省憲政協進會亦編了《中日文對照中華民國憲法全文》。

地區性的臺中一陽週報社出版了金曾澄的《民族主義解說》；臺南的新民書局出版了黃玉齋撰寫的《臺灣革命史》。

另一類是以討論歷史及戰後情勢為主的圖書，滿足了民眾關心局勢的心理，也溯源臺灣與中國歷史記憶，此類圖書的出版，成為戰後民眾透過中國的視野瞭解過去歷史的媒介。

由宣傳委員會接收的臺灣新報社，改名為臺灣新生報社，半官方的報社從1946年起到1947年陸續出版了一系列日文的《時事解說叢書》，這套叢書包括了《聯合國大會其？成立？經過》、《國共談判一年？回顧》、《國民大會中米商約？幣制改革問題》、《東南亞細亞？民族解放運動》、《米蘇關係？解剖》、《日本降伏當時？米國》、《太平洋戰爭勃發??》等。⁹³

新生報社於1947年時，編輯了兩部重要的參考書，一是《臺灣年鑑》，該年鑑是對臺灣文化、教育、農林、礦產、工業、交通、經濟、政治等狀況的記載；另一部則是《臺灣名人寶鑑》，該名錄搜羅各界名人5,000人，刊載其姓名、別號、現職、籍貫、學、經歷等項目；這兩冊工具書，全都是十六開本，約1,000餘頁，售價分別是500及700元。

新生報社並且以徵稿方式編印了一系列的《新生叢書》，希望以介紹中國文化及世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藝、哲學等學術上有價值的著作出

⁹² 《臺灣新生報》，1947年4月3日，版4。

⁹³ 《臺灣新生報》，1946年5月11日，版4廣告。

版，⁹⁴這套叢書包括了《鷹揚大海》、《破釜沈舟》、《內科學—傳染病》、《喀什米爾新志》、《中國近百要》、《白話文作法論解》、《大尉的女兒》等書；其中1946年5月時出版了中文版李純青的《獻曝》，李純青原是重慶《大公報》的特派員，在臺灣旅行考察1個月後，回上海整理其臺灣紀行，並提出臺灣應興革事項、時事評論等76篇作品，合輯為《獻曝》。⁹⁵

同為報社機構的民報印書館，於1945年發行《中國之命運》，1946年時發行了《投降後日本的真相》、《太平洋戰爭真相》、《中國各種紀念日解說》及《中華民國財政金融法規》。人民導報社曾出版過《亞洲之路》，針對亞洲動向及途徑加以闡述，及曹未風所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談的是二次大戰始末。全民日報社出版鍾中培所撰寫的《從亭子腳下看臺北》，時間是1949年1月。

二二八事件後，柯台山著《重建之路》一書，將親身經歷各地，其視聽所得的，以寫實方法寫出二二八事件前後社會種種畸形現象，希望能確定臺灣的地方自治精神，此書得到丘念台、林獻堂、楊肇嘉等人推介；⁹⁶與二二八事件有關的圖書，尚有由臺灣正義出版社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親歷記》。

到了1948、49年這類圖書廣告開始減少，一方面是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對祖國熱潮的退卻；一方面則是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在現實民生問題的衝擊下，對於這類認識祖國類的議題，已不如戰後初期那麼熱衷。

五、文學作品中日對譯的出版

由於過多出版資源投入以實用價值為主的教科書及學習教材市場，或以現實認知為題的圖書，以致象徵精神層面的文學創作，可用資源相形之

⁹⁴ 臺灣新生報徵稿啟事，《臺灣新生報》，1946年9月24日，版5。

⁹⁵ 黃玉齋編：《臺灣年鑑》，頁1422。

⁹⁶ 《公論報》，1948年1月27日，版2。

下就少了許多，另一方面也受限語言文字的轉換，真正創作的出版品絕少，如果有也是以日文完成的創作；即使國語運動仍在推行中，日文圖書仍是一般人主要閱讀的讀物。

戰後第一位發表小說的是龍瑛宗，從汕頭來的男子⁹⁷及青天白日旗⁹⁸，這兩篇日文小說都是以單篇形式發表於期刊，時間是在1945年11月。戰後初期臺灣剛開始有圖書出版的是日人經營的東寧書局，1945年出版了林熊生（金關丈夫）的日文小說《龍山寺?曹老人》。

戰後的臺灣三省堂亦以三省堂名義，於1946年3月出版楊逵短篇集《鵝媽媽出嫁》日文版。

這時期重要的文學作品出版首推吳濁流，其日文小說《胡志明》，共4篇，於1946年先後出版，由臺北國華書局發售。這是日文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的最初版本。⁹⁹這部書被稱為殖民地文學的代表作，是吳濁流在戰時的作品，當時他一個人在臺北上班，利用下班時在住所偷偷寫下，寫好的稿子則塞在木炭籠子裡面，再利用每週末回新埔跟龍潭中間的老家時藏起來。戰前即已全部脫稿，戰後出版。¹⁰⁰因此在戰後文學創作極少，少數圖書創作仍屬戰前的作品，留至戰後出版。

吳濁流是少數戰後仍持續創作的作家，在1947年時他又出版日文單行本《黎明前的臺灣》。1948年5月問世的日文小說《波茨坦科長》，由臺北的學友書局出版。

到了1947年時的文學作品出版，有賴和短篇小說集《善訟人的故事》，由臺中民眾出版社出版。

全版的日文圖書仍是主要的出版品，引起政府注意，在1947年6月25

⁹⁷ 發表於《新新》創刊號。

⁹⁸ 發表於《新風》創刊號。

⁹⁹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光復後臺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臺北：該會印行，民國84年），頁15。

¹⁰⁰ 鍾政肇著，莊紫容編：《臺灣文學十講》，頁234。

日臺灣省政府開始禁賣三十六年度出版的全日文版書籍。¹⁰¹

全版日文圖書受到限制，原本以日文創作的作家必須重新學習國語，對於過去以日文從事創作的文藝人士，除了閱讀書籍缺乏外，還要面對語言文字環境的轉變，在創作上亦受到挫折。葉石濤在其《文學回憶錄》一書中即道：「臺灣光復對作家而言，第一、衝擊力太大了。要瞭解、要學習的東西太多了。經過五十年的隔閡，祖國的歷史、文化，他們完全陌生的，他們要從語言的學習開始，一直到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都是他們吸取的對象，幾乎是狼吞虎嚥，那有餘力寫作？第二、生活不安定。長久的戰亂，民生問題相當嚴重，糧食缺乏、物價飛漲，經濟浮動太快太大，現實生活的壓力逼得他們喘不過氣來。」¹⁰²

因此許多創作人士無法立刻改變賴以寫作、思想的語言，而終止創作；但也有為了延續本身的創作和臺灣的文學命脈的作家，開始銳意學習國語文，力求克服語言的障礙，如鍾理和、施翠峰、廖清秀、許炳成、鍾肇政、陳火泉、鄭清文等。¹⁰³他們大多是戰後始從勺勺口口學起，歷經一段「由日文到中文」的艱苦過程，亦即先用日文思考，再譯為中文寫在稿紙上。¹⁰⁴

在作家作品減少的情形下，由譯註性質的中日文對照的圖書取代了創作的空窗期，中日文對照圖書除了便利熟悉日文的讀者閱讀，其目的也是為介紹中國新文學作品到臺灣。因此從1947年起大量的中日文對譯的圖書出版，1947年時標準國語通信學會出版由王禹農日文譯注魯迅的《狂人日記》，全書共52頁。¹⁰⁵

¹⁰¹ 薛化元等編註：《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七）—新聞自由》，頁105。根據電文內容：「查三十六年度出版全日文版書籍、雜誌、小說，其內容有宣傳日本優點，或描寫中日戰爭概略，詆毀祖國等文字，應斟酌情形，予以禁賣。」

¹⁰² 葉石濤：《文學回憶錄》（臺北：遠景，1983年），頁270。

¹⁰³ 王鼎鈞：作品充滿鄉土色彩的臺灣作家，《文星》，5卷2期（1959年12月），頁23-25。

¹⁰⁴ 林海音：臺籍作家的寫作生活，《文星》，5卷2期（1959年12月），頁26-29。

¹⁰⁵ 全國圖書聯合目錄，該書目前在國家圖書館仍有典藏。

東華書局特聘楊逵編輯出版一系列的《中日文對照中國文藝叢書》，總計出版六輯。第一輯為中日文對照的魯迅《阿Q正傳》、郁達夫作品《微雪的早晨》，以上是由楊逵日譯；還有茅盾作品《大鼻子的故事》、楊逵作品《送報伙》等，則是由胡風所譯。¹⁰⁶

到1947年時東華書局又出版了符合小朋友閱讀的中日文對照的漫畫書《夢借芭蕉扇》，當時刊登於報上的廣告辭是「這冊漫畫全篇中日文對照為啟導小朋友們研究國語最好的漫畫書」。¹⁰⁷中日文對照圖書為了原本慣以日文閱讀的讀者，在取締日文圖書的政策下，開了一扇便利的窗，為了圖書有人閱讀，至於是否是「研究國語最好的漫畫書」那就不太重要了。

東方出版社在這時期也推出了中日對照叢書，標榜的是學習國文國語，欣賞現代文學的著作，有由王禹農日文譯注魯迅的《孔乙己、頭髮的故事》、《藥》；除此還有藍明谷翻譯的《故鄉》，則是由現代文學研究會於1947年8月出版。

其實早在1945年前後，臺灣文學市場開始出版了不少魯迅的作品，這是因為編譯館館長許壽裳抵臺後，開始在臺灣文化協進會¹⁰⁸的刊物《臺灣文化》雜誌上，向臺灣大量的介紹魯迅文學。¹⁰⁹其文章除刊登在《臺灣文化》上外，還刊登在報紙上；在他的協助下《臺灣文化》還製作了一期

魯迅逝世十周年特輯，這是戰後臺灣第一次有系統的介紹中國作家魯迅。特輯刊出後，造成臺灣閱讀魯迅文學作品的風氣，因此在1947年時出版的中、日對譯圖書，幾乎以魯迅作品為主，如前面提到楊逵翻譯的《阿Q正傳》，王禹農翻譯的《狂人日記》、《藥》、《孔乙己、頭髮的故事》等均是魯迅的作品。

¹⁰⁶ 文建會編：《光復後臺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頁16，及全國圖書聯合目錄。

¹⁰⁷ 《臺灣文化》，2卷9期（1947年12月），封面內頁廣告。

¹⁰⁸ 游彌堅是臺灣文化協進會的發起人，其組織成立宗旨：「聯合熱心文化教育之同志及團體，協助政府宣揚三民主義，傳播民主思想，改造臺灣文化，推行國語國文為宗旨。」臺灣文化協進會章程，《臺灣文化》，創刊號（1946年9月15日），頁28。

¹⁰⁹ 這是因許壽裳與魯迅、陳儀三人同為留日的同鄉—浙江紹興人，三人之間感情深厚。

此外，在1947年6月時，文化協進會還出版了許壽裳所著有關魯迅的評論集《魯迅的思想與生活》，這也是戰後臺灣第一本有關魯迅研究的專著。從這一點也能佐證戰後臺灣魯迅文學的讀者群，一直在持續增加中。可是，隨著1948年許壽裳遇害，1949年國府遷臺，魯迅的作品逐漸在市面上消失，轉成地下文學。¹¹⁰

1949年政府遷臺之際，由於時局動盪不安，與對岸中共處於緊張敵對狀態，政府遂於5月20日起實施戒嚴令，宣布全省戒嚴，凍結一切言論、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等權利；並於同年5月28日訂定「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對攜入新聞雜誌圖書實施嚴密檢查制，¹¹¹1951年又規定「書刊經銷辦法」，管制書刊進口，規定未經事前核准的匪偽書報刊物一律不准進口，¹¹²原本臺灣本土出版的圖書即已不足，此段時期又切斷了原本直接由大陸供應中文圖書的管道；另一方面隨政府遷臺的外省人移入，改變了社會人口的組成結構，中文圖書的需求量增加；中華、商務、世界、開明等大書店，雖有自大陸搶救運臺的圖書，但在出售一本便少一本的情形下，¹¹³臺灣的圖書市場，仍是處於缺書的狀況；在經歷過這段時期後，這些出版社漸漸摸索出翻印舊書是一種成本最低、出書最快的方式，於是臺灣的圖書出版開始邁入一段翻印的風潮。

¹¹⁰ 黃英哲：《許壽裳和臺灣（1946-48）兼論二二八前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文化政策》，頁133-134。

¹¹¹ 「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三項：「各港口交通站之檢查機關，對旅客攜帶之行李及在該地起卸之印刷品應嚴密檢查，如發覺有該項文字記載，應即沒收，並視其動機及數量之多寡決定對持有人懲處與否。」

¹¹² 臺灣省政府代電「規定書刊經銷辦法希遵照辦理」：「1.各書店、各書報社、各文化供應社購買省外印行之書刊，務須先辦理申請手續，經核准後始得購入。」

¹¹³ 《臺北市志·卷八·文化志文化事業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年），頁25。

伍、結語

綜觀而言，戰後初期的臺灣，在圖書出版上仍是處於一片開荒墾地之中，官方出版品與國語學習教材就占了圖書出版的大部分，而順應時勢的國族認同出版品又占了其中的一部分，真正屬於民間的創作品絕少，那是因為經過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戰後隨著政權的轉移，文字語言被迫重新改變，對於本土作家而言，面對文字的轉換，失去了創作空間，像是陳火泉，戰後學著中文，「從『人之初、性本善』『昔時賢文、誨汝諄諄』學起，要不就開始『ㄅ ㄆ ㄇ ㄏ』地牙牙學語。祖國的方塊字一隻隻堆起，形成一堵高牆，聳峙在他們眼前」。¹¹⁴在學習寫作的過程中，丟進字紙簍的稿紙，成了生火煮飯的材料，等到首篇中文作品刊出時，已是九年後的1954年了。其他的作家莫不是如此，戰後面對語言文字環境的轉變，他們為了延續本身的創作和臺灣的文學命脈，從戰後開始學習國語文，皆經歷了一段艱苦的過程。

除了文字語言的困難，更難的是在面對全然不同的文化時，在現實生活的壓力下、國族與語言文化的認同下，所表現出一種精神層面的茫然，除了原以日文從事創作的作家失去了創作空間，一般民眾也因為中文、日文圖書的缺乏，無書可讀。

市面上可閱讀書籍的缺乏，在於1947年全日文圖書的禁止販售，同時也銷毀了不少的日文圖書，仰賴讀日文書獲取知識的知識分子面臨無書可讀的窘境，再加上原本報紙的日文版消失，市面上的日文讀物越來越少。

無法適時出版中文圖書，而必須仰賴進口中文圖書的臺灣，又因運費昂貴，以致圖書一直匱乏，在1946年楊乃藩在其〈怎樣供應本省的精神食糧〉一文中提到臺灣中文圖書成了少數人的享受：

國內書局來臺成立分店的只有正中和兒童兩家，在籌備中者

¹¹⁴ 鍾肇政：〈文學的苦行僧—談《人生三書》作者陳火泉〉，刊於陳火泉：《人生長短調》（臺北：九歌出版社，民國79年）。

有開明，而這三家目下的工作只限於將各自的一些出版物搬來銷售。而且因為幣值的差異，運輸的困難種種原因，即使把國內的書報搬到本省來，也因售價過昂，只能作為陳飾，供少數人的享受，要使一般人普遍的閱讀，還是辦不到。¹¹⁵

又因為在戰爭頻頻動盪的環境中，影響著當時的經濟，臺灣的物價曾一度狂漲，在尚未抑平時，又發生二二八事件，物價又繼續躍進，到1947年3月時，臺灣米價比上海還高。¹¹⁶在艱困的經濟環境中，買書並非人人所能負擔。

如果以全國出版業的中心上海來看，一個人生活每月需要法幣二、三十萬，以2,000至3,000元買一本書不算一回事，但是書籍進口臺灣後，一本書的價格約100元臺幣，¹¹⁷以當時一位報社校對員來說，從晚上工作到天亮，薪資約有臺幣500到600元，一本書占了月薪的五分之一，超過了一般人所能負擔，而圖書價格又節節高漲，「閱讀」在通貨膨脹的年代成了奢侈的享受，也改變了民眾的閱讀習慣。除了經濟充裕的人可購買進口圖書外，對於仰賴圖書的知識分子或可藉著找人借閱、或上圖書館的方式找到書看，但一般人在民生問題成了生活的負擔時，不得不放棄過去以看書消遣的習慣，到了1948年初時，我們可以從《公論報》上的短文看到當時讀書風氣的改變：

臺灣的讀書風氣，本來是很好的，這不是誇張，也不是自譽。隨便舉個例：兩年前後，不管任何人，總可以在火車站的候車室裡，看到一般候車的男女，大都手持一冊，利用候車的時間去讀他們愛讀的書刊。甚至於辦公廳裡，也可時常看到一般下級職員，偶爾無事可做，便翻開隨身攜帶的書刊來閱讀。但光復以後，至今不過兩年多，而這種優良的風氣，卻幾乎消失無餘了。

¹¹⁵ 楊乃藩： 怎樣供應本省的精神食糧 ，《臺灣新生報》，1946年6月11日，版5。

¹¹⁶ 物價應抑到變亂以前 ，《臺灣新生報》，1947年3月23日，版3。

¹¹⁷ 論本省文化建設 ，《臺灣新生報》，1946年6月19日，版2。

作者認為一般人已不讀書的原因有二：第一，是無刊可看；第二，是可看的書刊實在太貴了。¹¹⁸

社會環境因為政權的更替、經濟的消長，不論作者、讀者、出版者都面臨新的改變；除了政府機構透過政令及印刷資源設備的掌握，可以讓出版品成為政令宣導工具外，民間的圖書出版事業發展不易。少數民間的出版必須適應社會總體環境，擔負起教育、教化的使命，教育出版品成了民間出版機構的大宗。臺灣的圖書出版業隨著1949年政府遷臺後，政治環境的不變，及社會人口結構的改變，整個出版活動又有不同的發展，綜觀而言，圖書出版受到社會變動的影響，同時也影響著社會變遷。

徵引書目

旬期刊、報紙、公報

《中央日報》，民國39年。

《公論報》，民國36年11月至38年8月。

《臺灣民報》，民國34年10月至36年2月。

《臺灣新生報》，民國35年8月至38年10月。

物專書

王國璠編撰，《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省立新竹社教館，1974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民國81

¹¹⁸ 金星：挽回讀書好風氣，《公論報》，1948年2月10日，版4。

年。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中文圖書目錄—民國元年至38年》。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民國71年。

傅寶玉編，《抗戰與臺灣光復史料輯要：慶祝臺灣光復五十周年特刊》。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84年。

黃玉齋編，《臺灣年鑑》。臺北：海峽學術，2001年。本書原於民國36年由新生報出版。

葉石濤，《文學回憶錄》。臺北：遠景，1983年。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光復後臺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民國84年。

臺灣文化協進會編，《臺灣文化》，1卷至6卷，覆刻版。臺北：傳文文化，民國83年。

臺灣省文獻會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文化事業篇》。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5年。

臺灣省文獻會編，《臺灣近代史》。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7年。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臺灣一年來之宣傳》。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民國35年。

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臺灣統治綜覽》。明治41年，成文出版社1985年影印。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羅珞珈譯，《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件》。臺北：時報文化，1993年。

薛化元等編註，《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七）—新聞自由》。臺北：國史館，民國91年。

鍾肇政著，莊紫容編，《臺灣文學十講》。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

狂期刊論文

- 王士朝，文學圖書印刷設計之演變，收錄於《五十年來臺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訊，1976年。
- 王鼎鈞，作品充滿鄉土色彩的臺灣作家，〈《文星》，5卷2期（1959年12月）〉。
- 何義麟，戰後初期臺灣出版事業發展之傳承與移植（1945-1950），〈《臺灣史料研究》，10期（1997年12月）〉。
- 吳瀛濤，日據時期出版界概觀，〈《臺北文物》，8卷4期（1960年2月）〉。
- 周婉窈，臺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新史學》，6卷2期（1995年6月）〉。
- 林海音，臺籍作家的寫作生活，〈《文星》，5卷2期（1959年12月）〉。
- 河功原作，黃英哲譯，戰前臺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下）—以三省堂為中心，〈《文學臺灣》，29期（1999年1月）〉。
- 黃英哲，許壽裳和臺灣（1946-48）兼論二二八前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文化政策，收錄於《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1992年。
- 蔡盛琦，日治時期臺灣的中文圖書出版業，〈《國家圖書館館刊》，91年2期〉。
- 蕭聖雄，臺灣二二八事件的經濟和文化背景，〈《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1992年。